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关系史概论 (1949—2000)

牛军◎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关系史概论 (1949—2000)

牛军 ⊙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牛军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5889-0

I. 中… II. 牛…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2000-高等学校-教材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3601号

书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

著作责任者: 牛 军 编著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89-0/D·24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3.75印张 414千字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1949—1955)	33
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缘起	35
第二节 与苏联结盟	45
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	51
第四节 抗美援朝	55
第五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	72
第六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6
第七节 参加亚非会议	91
附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96
2. 周恩来致各国政府公函	97
3.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98
4.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99
5. 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101
第二章 发展与波动的十年(1956—1965)	102
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105
第二节 中苏同盟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114
第三节 探索解决陆地边界遗留问题	142
第四节 中美大使级会谈	168
第五节 建立和发展与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	175

第六节 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反对美国的干涉与侵略	181
附录	
1.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节选)	189
2.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193
3.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194
4. 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195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1966—1976)	196
第一节 极“左”外交思潮及其影响	198
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	206
第三节 打开中美关系僵局	214
第四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	225
第五节 对外关系新局面	229
第六节 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与“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	235
附录	
1. 中美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	24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245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	248
第一节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提出与形成	249
第二节 中美建交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258
第三节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266
第四节 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发展中日关系	275
第五节 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277
第六节 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280
第七节 支持和参与国际裁军	283
第八节 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285
附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28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 联合公报	28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289
4.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291
5.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9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97
7. 中苏联合公报	299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2000)	303
第一节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304
第二节 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308
第三节 建立与发展中俄关系	314
第四节 稳定与发展中欧关系	319
第五节 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	323
第六节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边关系	327
第七节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332
第八节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	334
附录	
1.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更大胜利(节选)	337
2. 中俄联合声明	339
3.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 21 世纪(节选)	343
4. 中美发表联合声明	344
5. 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348
6. 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宣言	350
结语 1	353
结语 2 世界的中国:21 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	359
参考书目	369
后 记	372

导 论

一、研究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可以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但准确地说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外交”这个概念是指各国政府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策和交往过程。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当代国家的对外关系，则会超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中，除以中国政府为主体的外交关系外，还包括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行为者的党际关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军事外交，等等。它们在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发挥着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进程看，随着经济的日益开放与社会的迅速变化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已经和必将变得更为广泛、丰富和复杂。

关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地区后，那里实际上存在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从法理上说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部分。理由很简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是，如何定位、定义和阐述台湾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非常敏感、复杂和困难的课题。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科书中，都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始终与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处理台湾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密不可分。显然，台湾地区对外关系的演变对中国对外关系

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逐步研究和补充这一领域的内容是重要和必要的工作。

二、教学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而且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首先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当代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外部世界交往,越来越迅速和深入地融入世界,中国对外关系必定会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和认识,对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知识,是培养人文关怀和提升智慧的基本和关键性要素。当然,历史知识有档次之分,这里指的主要是理性的知识。这些理性知识是认识当代重大事务的基本参照、比较体系和坐标,是启发智慧的基本要素。失去了历史知识的支撑,很多思考就失去了逻辑的起点和参照系,既不可能形成经验,更不可能产生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作为历史知识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包含其中了。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命题,如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等等;也有一些关乎人类命运的思考,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等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规律(如是谁在创造历史,以及如何创造历史),国家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和本质,等等。对这些基本命题和思考的探索与回答,同样在影响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

就中国人的内心关怀而言,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国人不仅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而且至少也是同样迫切地需要了解自己,包括了解自己曾经根据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政策为指导,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相处和交往。

中国人的这种关怀源于对中国人个体、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等的命运的期盼和无法回避的关心,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赖以存在的支柱。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研究都证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等种种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基本名称,都是在同其他人民、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和比较中产生和确定的。当我们提到“中华民族”,就会想到勤劳、勇敢、智慧、坚忍不拔和热爱和平。这些不仅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在同其他民族交往和比较中概括出来的。当我们问,中国是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想到“东方的”、“历史悠久的”、“近代遭受过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更是从国际交往中概括和定义出来的。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从那时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同中国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外关系的极其复杂性导致了中国人对中外关系认知的严重矛盾性，并极大地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规模变革，甚至部分决定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式、规模、深度和客观上越来越激进的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历史的缘起和发展，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外关系史发展过程中一次革命性的跃进。不过客观地说，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如何认识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同近代历史中产生的基本问题一脉相承。对那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必将极大地影响中国人的未来。

上述非常基本的历史过程必然促使中国人希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曾经同外部世界形成过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关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应如何定义过去所经历的种种过程，包括苦难和教训；今后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等等。没有哪个问题是可以轻易给出答案的。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未必就能完全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肯定不能全面和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以上仅仅以最基本的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对塑造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而且今后必定会更加重要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必定要不断形塑并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公众普遍认同的自我形象，并通过持续发展和调整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界定与自我形象相符合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定今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其中包括世界观、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等，从而影响中国和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必定是中国人认识和理解当今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学科。中国人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也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确实是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知识。

再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有所谓“经世致用”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同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一样,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是在各种有价值的参照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必定要受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的影响。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理论知识;其二是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和经验;其三就是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知识,包括对历史过程的真实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合理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治理过程是比较重视历史经验的,这个特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它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尽管就现实情况而言,一些方面包括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经验所应该和必然产生的巨大作用不够重视,甚至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如国际关系史或一些大国的对外政策史研究更重要,当然更不如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重要了。由于档案没有完全解密,有关研究受到比较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客观因素。但主观上由于不了解以致不重视甚至无视这部分历史经验已经和必定会继续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不重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历史反复地证明,对于决策者或决策主体来说,历史经验是一类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能取代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经验也是任何理论知识都不能取代的参照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今天和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态的基本分析和判断,并进而影响对外政策的质量。

三、学习的基本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重要的外交活动、有关的外交人物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等等。认识和掌握这些丰富的知识有很多角度,也有很多历史线索。其中基本线索有三条,即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一) 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解近代以来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

建国前历届政府的外交联系在一起；它是基于对此前中国外交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而不是此前中国外交的自动延续或有意继承。在这方面，世界上相反的例证大大多于相同的例证。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生对研究革命国家的外交是有典型意义的。

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意义上来讲，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直接转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如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形成、组织建构和人员构成等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不过，所谓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而且主要还不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塑造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政策就是在国共内战后期（1948年冬至1949年春）制定的。在最深层面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如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现代正义诉求等，都是在革命运动时期酝酿成熟并最终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之中并逐步扎根。所以，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关系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痛苦和破坏。从清王朝崩溃到辛亥革命失败，无论中国的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试图或已经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以建立符合他们利益的对外关系，其后果几乎都是造成中国的各种权益不断地丧失，以及外部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日渐深入。

另一方面，正是不断加重和深化的民族危机成为一度消沉涣散的革命运动再一次兴起的催化剂，导致了一波又一波并日益加速的社会下层的民众反抗运动和上层的各种形式的改良运动，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

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必定同时兼具政治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它的目标就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种以平等为其核心诉求的全新的中国对外关系,进而争取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

20世纪初兴起的反帝革命运动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呈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很多地区蓬勃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在亚洲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即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裂解了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这一选择对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将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作为它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他们将中国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等,几乎从一开始就铸成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对外政策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这个认识框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认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对中国

^① 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1922年7月。

对外关系产生了至为巨大和深刻的影响。不仅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由于苏俄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而出现裂解,而且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坚定选择。这一选择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正是基于上述的信念和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并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北伐战争,再到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这历时十余年的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当然也得到了苏联的各种支持和援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但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①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提出的“一边倒”方针也说明,他们开始考虑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与中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又同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从革命运动的领袖向国家领导人的转变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套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观点、他们在革命时代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关于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任何一项对外政策原则能够

^①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同一国之国内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反映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最初是同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贯彻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不久,及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殊,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历史逻辑与观念逻辑相互影响并高度统一的发展进程,最终铸造了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和最坚定的指导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固然有其客观需求,同时也需要有其他条件。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同样提出在外交中要独立自主,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难以坚持。晚清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列强有能力对中国内政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它们甚至能够直接利用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从而达到操纵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从中国内部看,不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以至于后来的国民政府,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在几乎所有那些矛盾、纷争的背后,都或明或暗地可以看到列强操纵其中的魅影。

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所有其他政治集团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有至今看来也是罕见的极为坚强的组织。中共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所组成的,他们长期保持着高度统一思想和统一的意志,甚至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政治性格。因此,任何一个大国当时几乎都没有可能在中共内部找到它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以达到影响中共内外政策的目的。这一特点在4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曾经像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坚忍不拔地深耕中国农村这片政治土地,从而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真诚和长期的支持与拥护。这片政治土地在那个时代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同时又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他们改造中国乡土社会的史无前例的努力,将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结起来,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没有这样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直到今天都视为指针的“独立自主”原则,最终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为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国际上赢得了列强赋予的巨大合法性,它最终却由于失去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土崩瓦解,并沦为列强的附庸,仰人鼻息。

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得到中国民众的基本支持,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长久维持的。

其次则是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和武装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深层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差不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十月革命、信奉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加于中国人的耻辱,使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那种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屈辱地位,以及摧毁造成中国这种地位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压迫和不平等。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经验也在激励着他们。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五族共和,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呈加速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思潮也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飞速变化。那个革命的时代造就了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的激情。中国的政治精英越来越相信和追求激进的变革,并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王侯,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毛泽东是他们中的典型。中国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荡涤旧中国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是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空前壮举,是一首无比壮丽的史诗。毛泽东相信,这场革命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对外关系,一举洗刷中国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并进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新型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毛泽东等一代人的政治经验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对革命的长期崇拜,其影响至大且久远。

总之,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它的特点和本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至深且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上说就是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目标。

（二）国际环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国际环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影响是一个不需要更多论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本来就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在不少方面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做出的反应。不过对国际环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的内容,仍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包括国际环境作为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在那些重大事件中它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仍大有丰富和深化的必要。

在最表层,国际环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表现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认识这些变化。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看,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另一个是“后冷战”或冷战后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被简单地称为是美苏两极对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走向。后一个阶段被称为是走向多极世界,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这种力量格局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当然两个阶段只是大略的划分而已,随着近十几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描述出一个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世界图景。实际上在每个阶段都有远比所谓“两极世界”或“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等复杂得多的内容,它们同样是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冷战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美苏两国在中国既互相限制又互相妥协的政策,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即二战结束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帝革命运动竟然没有受到列强的直接军事干预,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中国出现的美苏互相遏制,国共一竞雄长的局面,使国共两党都有机会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更具有智慧和谋略,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应付美苏对抗的局面而制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